

重点阅读

# 赤子情怀 一片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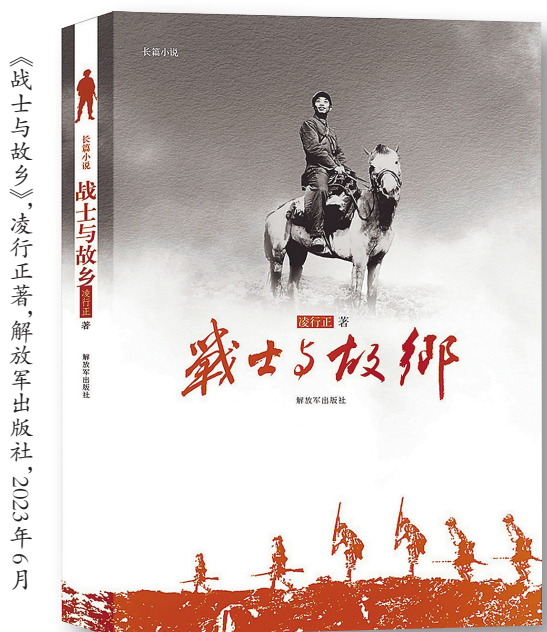
——我读长篇小说《战士与故乡》

□丁临一

93岁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凌行正同志是我们军队一位德高望重的编辑家，数十年来曾经呕心沥血发现培养了为数众多的部队中青年作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当代军旅作家，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散文“军旅青春三部曲”《初踏疆场》《铁血记忆》《感念西藏》及长篇小说《九号干休所》《腰斩七军》等，荣获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等诸多奖项。最近拜读了他赠予我的长篇小说新作《战士与故乡》，更是引发我由衷的崇敬之情。

《战士与故乡》具有鲜明的自传体风格，全书仅22万余字，可谓凝练之至，却具有沉甸甸的思想与情感分量。我们知道，在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中，“战士与故乡”是一个关乎军人的记忆、动机及成长等方面线索的母题。那么，在一位年逾九旬的老革命军人的心中与笔下，故乡是什么样子的呢？

《战士与故乡》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主人公又五出生于1930年豫东南潢川县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因为主人公的出世使得大家庭里再次五世同堂，曾祖父高兴地给他起名又五。但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刚刚记事的小又五，除了小县城的街道、集市、南海小学等等地域人文风情，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日本侵略军对于手无寸铁平民的屠杀，一次大轰炸就炸毁了小县城的50多间房屋，炸死了88个平民。随着日本侵略军的逼近，难民潮一波又一波，日本兵烧杀掳掠的血腥残暴令人发指，小又五一家人不得不“跑反”，躲藏到偏远的山乡。随即又遭遇了土匪的绑架勒索，霍乱瘟疫流行，父亲、曾祖父、曾祖母相继去世。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一家人返回小县城，保甲长没完没了地收家苛捐杂税，国民党军队随心所欲地征房征粮，随时随地成为一家人的噩梦。进入中学读书的又五，也因为与同学们一起读进步书籍而被国民党教育视为眼中钉，家里遭到警察搜查，国民党教育判定其“操行”不合格而不能升高三。概而言之，18岁之前的



《战士与故乡》，凌行正著，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6月

又五，记忆中亲身感受最为深刻的就是战乱、疾病、压迫给故乡和亲人带来的摧残与痛苦，一颗向往新生活、向往新中国的种子已经在心中萌芽。因此，当1949年进军江南的解放军在小县城征集知识青年入伍时，又五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解放军。

在《战士与故乡》的前半部中，母亲的形象成为引人注目瞩目的亮点。大家庭的孙媳妇早早地承担起侍候长辈、养育子女的重任，丈夫撒手人寰，五世同堂的大家庭一朝解体，生活的重压可想而知。从小体弱多病的又五，铭记着29岁即守寡、拉扯着3个孩子长大的母亲独立支撑家庭的点点滴滴；为孩子寻医问药，送孩子去私塾补习古文，在孩子偶有顽劣时不忍责罚、只是轻轻嘱咐“你要争气”、“你要争气”四个字，可以说

是概括了天下母亲对于儿女的所有期望，从此铭刻在又五的心中未曾忘怀。当又五选择了参加解放军，深明大义的母亲虽然万般不舍却连夜为孩子缝制衣裳的场景，恰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经典写照。因为爱故乡、爱母亲，所以选择离开故乡、离开母亲去投身人民军队，投身创建新中国、创建新生活的时代潮流，成为19岁的主人公水到渠成的人生选择。

又五参加解放军后的经历十分丰富，他亲历了解放战争中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金城反击战，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以及保卫南疆的边疆作战，由一名野战军宣传队战士逐步成长为战地诗人、战士作家及军队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干部、领导。随着眼界的开阔、素养的提升、战斗业绩与文艺创作业绩的积累，他对故乡、对母亲的情感依恋愈加加深。在解放战争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想到的是让全中国人民都能够远离战乱、疾病与压迫，过上好日子；在抗美援朝战争、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戎马生涯中，他想到的是保家卫国，让所有的母亲都能享受到岁月静好。当西藏民主改革后邮电局第一次出现在念青唐古拉山脉北麓时，又五在战地给断了联络许久的母亲发来电报：“儿在守卫祖国边疆，祝福母亲扎西德勒。”这平凡的一幕令人动容。在中国革命军人的心中，故乡、母亲永远具有无可替代的分量。《战士与故乡》深厚的思想内涵及动人的秘密，经由老作家饱含深情的简洁文字在书中得以显现。

《战士与故乡》作为一部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文字朴实无华，可谓惜墨如金，但作品中的历史生活容量丰富，主人公情感纯净浓烈，堪称是一位老革命军人献给故乡、献给母亲的厚重之作。书中生动深刻地展现了新旧中国故乡的变迁，从参加解放军八年后第一次回乡探亲、亲眼见到小县城里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到新世纪乘坐高铁回家乡、走访现代化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大型企业……主人公爱故乡、爱母亲的浓烈情感逐渐融为一体，并通过自己书写家乡建设发展新成就的诸多散文和诗章直抒胸臆，传递出“故乡就是母亲”的赞叹感慨。作为读者，我们透过又五的目光抚今忆昔，也深深地领悟到一个革命老战士的人生理念与情感欣慰，那就是：投身人民解放军，投身创建新中国、创建新生活的时代潮流，追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砥砺前行。旧时代的战乱、疾病、贫穷、落后等戕害故乡、戕害母亲的历史及社会因素已经成为过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新征程中，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有信心也有能力保卫家园、保卫和平，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书人絮语

## 一次重要的“精神远征”

——评姜耕玉诗集《寂寥如岸》

□刘大伟

一滴都带有野性却透明而柔软”(《停在雨夜的荒原》)。与牛羊成群的牧场不同，荒原的构成要素更为复杂，生存其间生命体必须不断承受多变化气候的考验，尽管如此，荒原上的沙砾、草窠、旱獭和民众依旧保留着本色的一面，也就是诗人所言的“令人震颤的纯正”。显然，这种感知力的获得，与开阔、静谧的西部有关。

身处车水马龙的都市，人们的感受系统在日渐钝化，那些带有模式、复制和拼贴痕迹的现代工业产品，实难看到其纯真的底色。不得不说，诗人的这一“对比式”发现与感知，实质上就是在行进的过程中让自身的思想和精神获得西部大荒的检视与涤荡。一滴“带有野性”的雨水，它的降落姿态自由而松弛，但在巨大的寂静与空旷中，它又展现出自身的透明与柔软。众所周知，雨滴本身是尘埃的附属物，然而步入这样的高寒之境，诗人内心感受到的却是它们的洁净与透明，这样的表述极易令人想到诗僧慧能“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的偈语——心身一旦合一，它就是一面折射世界的镜子，何为实像何为虚像，自当一目了然。如果说这样的解读能够成立，那么可以认定的是，经过不停西行和思考，诗人的确实现了一次重要的“精神远征”，而这样的跋涉与远征，必定关联着一颗敏锐、纯净的诗心。

诗人来到西部，除了满眼的空旷与寂静，其探寻的眸眸必投向高处。因其之高，才有了昆仑神话中的“天梯”以及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慨叹。诗人对

西部高度的确认始于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波齐：“峰顶，白色的沉静。//七月的太阳滑下了山。//古寺顶的金属塔尖/渐渐隐入黯淡的蓝/卓玛拉山口那个转动经筒的人/手背沐着一道雪亮。//四周峰群巨人般肃立/拱卫绝顶升起炫目的光”(《静穆》)。可以想象，峰群之上的月光描摹着冈底斯山上的雪线，雪线之下，依次是古寺佛塔和手持经筒的长者——诗人以长焦镜头与近景特写叠合的方式，向读者描绘出地理与精神维度上的“西部高度”，这种高度实际上也是衡量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一把尺子，在这把尺子面前，诗人不由得发出这样的诘问：“冈底斯山敞开门/谁是陌生的人？/河谷的风吹着你也吹着我/钟声瞬间即逝在空中/一只大鸟盘旋而上/天边总露着笑容”(《行走在冈底斯山的旅人》)。相对于奔忙在高速路上无暇“打开”自己的人，西部大山的胸怀和门扉永远是敞开的，任由山风吹过、大鸟飞过、旅人走过；相对于城市空间的逼仄和压抑，在开阔的西部大地之上，人们能看到那里的天空“总露着笑容”。

有了行走的方向和高度的确认，诗人的“精神远征”便有了结实的诗思基础。我们可从长诗《魅与蓝》得出这样的阅读体验——从自然的西部到超验的西部，再从超验的体悟返回到生活的根底，诗人的远征之旅因之具有了超越性质的哲学之境。至此，我们不妨将诗集《寂寥如岸》的意义指向理解为诗人远征后的回归——让沉重的肉身靠岸，让自我精神空间得到哲思维度上的拓展。

文化与地理学上的西部，因其地理海拔的高峻和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具有某种神秘意味，历代文人大都产生过“到西部去”的想象与冲动。然而西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人们只能从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和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样的诗句中做出一个大致的揣测。明代以来，陆续有诗人行吟至西部农业区的河湟谷地，并留下了一些与西部有关的诗篇。直至“十七年文学”以后，现代新诗开辟出了气质独具的西部诗歌，杨牧、周涛、昌耀、海子、西川、沈苇等“外省”诗人似乎陆续收到了来自西部大地的“神秘召唤”，他们以“建设者”或“旅人”的身份相继抵达，并在那里写下了各自的代表作。

可以这样认为，西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诸多诗人实现“精神朝圣”的理想之地，南京诗人姜耕玉的《寂寥如岸》恰好也印证了这是其完成一次重要的“精神远征”后的创作结晶。这部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所涉地域与西藏、青海和新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介入西部这一时空场域时，主动为自己的“旅人”身份和“他者”眼光赋予了“朝圣者”和“探索者”的双重内涵。这样一来，诗人眼中的西部不仅呈现出自然风貌上的开阔和寂寥，也彰显出历史地理与文化传统层面上的厚实与旷达。诗人将诗集第一辑的标题命名为“向西向西”，不仅为读者指明了其行进的方向，更有一种因不断抵达而展现出愈发神往、沉醉的心路历程：“我是个过客/受臻美的雨线的鞭笞，多么好！/当年女士递来毛巾/我才感到有点冷”(《停在雨夜的荒原》)。

西部高寒，但诗人甘愿接受高原雨线的“鞭笞”，这样的情愫与“西部歌王”王洛宾“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歌唱有了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高海拔地区氧气相对稀少，一般的旅游观光者大都会产生身体上的不适感，进而减少探寻与审美的兴致。然而作为诗人的姜耕玉，在驻留高原的某个雨夜里惊讶地发现“这一片沙湿地草色，纯正得让人震颤”，行走在西部，他分明感受到“天地茫茫恍惚兮/惟斜在风中的雨线/仿佛从冥冥鸿蒙中延伸而来/每

新知新思

## 小众的研究对象 扎实的研究成果

——读李芳《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

□曹明升

我们在书写文学史时往往会有所取舍，被“舍”去的那部分，有时是因为作家的知名度不高，有时是因为相关文献太少，有时也会因为有的文体比较小众。子弟书就是这样一种相对小众的文体。子弟书是在清代八旗子弟群体中产生的一种说唱文学，流行于北京、天津和沈阳一带，随清亡而消逝，其文本也就散落各地，不为人知了。可见，子弟书不仅文体小众，而且文献难寻，难怪一般文学史著作都未提及。然而，只要研究者肯花力气去搜寻文献，并用合适的理论来解读文献，小众文体研究也能成果出众。李芳所著的《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就是小众文体研究的优秀成果之一，不仅呈现出了子弟书的完整面貌与来龙去脉，还在方法上为小众文体的研究树立了典范。

一般来说，小众的研究对象都需要研究者花大力气去各地搜寻文献资料。李芳动笔之前，先与黄仕忠、关瑾华一起对存世的子弟书进行了调查摸底、目验比对，编成《新编子弟书总目》与《子弟书全集》。在此基础上撰写的《研究》一书，自然以材料的“全”与“新”为特点，如无名氏的抄本《子弟图》、爱新觉罗·奕康的稿本日记《小黄梁》等，都是首次披露的子弟书文献与相关资料。正是

作者的努力与坚持，使大量珍稀的子弟书文献得以重新面世，也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同时，《研究》在对文献的考辨和使用方面亮点尤多，还在“余论”中前瞻性地提出了要探索建立说唱文学的整理方法的设想。作者既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放眼世界，摸清家底，完善已有的目录”“编撰说唱文学目录”“对说唱文学进行校勘”的学术步骤，又结合子弟书的整理实践，分享了如何在文献整理过程中有效保留说唱文学文体特性的具体经验。这不仅是作者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建立说唱文学文献学的理性思考。

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研究》还对子弟书的

起源、名称、作者、题材、演出和流传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子弟书的方方面面。在这一系列研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每一章开头几乎都会列出想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第三章“子弟书的文体”，开篇就提出“何谓子弟书”，这是一个关乎子弟书艺术本质与文体特性的重大问题。作者在引言里又进一步将其分解为若干个小问题，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书写方式，既明确了本章的研究目标，又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是一种较为可取的研究范式。又如，《研究》的第四章看似在探究“子弟书”的称谓问题，实则揭示出子弟书这种曲艺形式的确立过

程。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层层深入，以小见大，与堆砌资料、泛泛而谈的论著不可同日而语。《研究》不仅注重问题意识，还能提出具体的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面来审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范式。作者将之总结为三大理论视点：雅俗文学、民族文学和说唱文学。例如从雅俗这一点来看，文学史上的雅俗之别由来已久，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既有壁垒、又有沟通。《研究》指出，子弟书是先由满族人创造，文词、演唱与内在品格皆以“雅”为尚，后来才逐渐从高门大宅传播至民间大众。也就是说，子弟书后来虽以俗文学的面目示人，但其传播路径却是由雅入俗，与一般想

书香茶座

历史并不如烟。

1822年1月，中国造巨型豪华帆船“泰兴”号，满载乘客2000余人和百万余件青花瓷及大量丝绸、茶叶等货物，从厦门驶往巴达维亚(雅加达)，行驶到爪哇岛海域时不幸触礁沉没，1800余人丧生。这是胜过“泰坦尼克”号的巨大海难。如此重大事件，历史虽有记载，但鲜有人知，也不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和鲜活的人事交易。永远的“泰兴”号是古代中华儿女不畏艰险、开放进取、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开展海外贸易的见证。它虽然不幸触礁沉没，但体现着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广阔视野和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作家于强的新作《泰兴号》以长篇小说为载体，细述了这艘东方“泰坦尼克”号的生死离别，将此重大历史事件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需要文学的虚构想象，需要人物、情节和矛盾冲突。但以重大现实与历史题材为背景的小说不能天马行空、任意驰骋，需要对事件本体熟稔于心、深入认知，将历史与文学有机融合在一起。这既需要学者严谨求实的态度，还需要作家情饱满的艺术构思。于强在年逾古稀后创作力不减，反而愈加旺盛，近年来创作了《海啸生死情》《爱在上海诺亚方舟》《丝路碧海情》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都发生于重大现实与历史题材，有真实的社会背景，视野开阔，意义深远。他不仅熟练把握了文史结合的写作方法，还曾经专程去过印尼的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巴厘岛，考察过郑和下西洋的踪迹，对“泰兴”号出海海域岛屿的海情风俗有所了解。他也曾多次赴德化访谈，参观过德化陶瓷博物馆、古瓷窑址和古瓷交易所遗址等，阅读了大量有关德化的历史、瓷器、窑瓷以及其他海洋方面的书籍。经过精心构思、潜心创作，他又完成了《泰兴号》这部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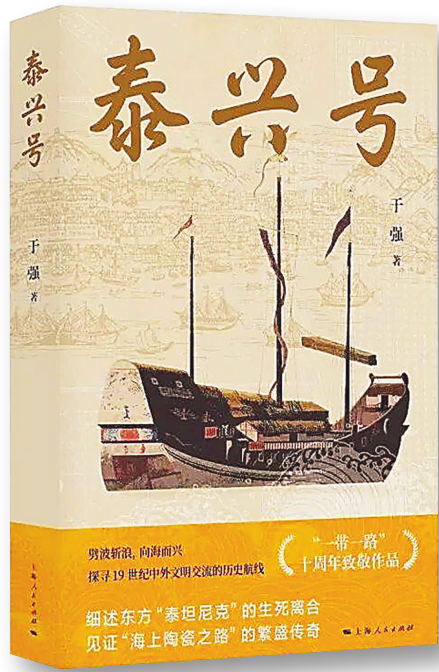
由于“泰兴”号所载青花瓷大多为德化所产，小说便书写了德化这片土地上的风情人物及各种社会矛盾纠葛，如藤似蔓地交织在一起；既有两个存有世冤的著名瓷窑主的子女何祖耀与成雅芳之间不移的爱情，也有虎豹闯关关女儿宋慧芝对何祖耀真挚的单相思；既有南洋奸商苏阿突谋取何家祖传的国宝观音瓷塑，也有领导百姓抗争领袖程洪被县令江老爷无情杀害，其子程剑飞逃亡海外多年后返回德化，力图报仇雪恨并寻找失落的女儿；还有穷书生郑文山带着儿子和养女在街头卖艺，身患绝症而向“批脚”(往返南洋与国内的使差，传递钱与书信)林阿福托付携带子女到南洋投亲……作者用白描手法清晰讲述了纷纭的故事，善恶分明地描绘了多个人物。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恰到好处地渲染了闽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仿佛穿越历史，使读者沉浸其氛围之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间烟火味。细品其味，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美德，如对爱情的忠贞专一、对强暴的顽强抗争、对朋友的侠义诚信，以及对瓷艺工匠精神的崇奉与坚守，等等。

“泰兴”号是一个大舞台。它不但承载了大量物资，更承载了各界人等：这里有下南洋的劳工，有寻亲者、复仇者，还有情人、僧人、商人和卖艺的童男女；有追求爱情而忍辱负重的女侠，有忠于友情与职守的信使，也有居心叵测的官与贼。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集于一船，在船体舞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小说在展现人类社会爱与憎、善与恶的同时，更是书写了“泰兴”号遭遇海盜与触礁的历程，以及船上各种人物的不同表现与命运，也将这部书的波瀾推上了惊涛骇浪。

“泰兴”号遭遇的第一波危险是海盜的袭击，商船危在旦夕，但经船员生死血战与多人的倾力相助，终于击溃了海盜，使得商船有惊无险。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船长从残存的一个海盜嘴里得知另一股海盜在马六甲海峡埋伏，准备劫掠“泰兴”号。这导致船长决定改变原定航线。“泰兴”号穿过了盖斯潘海峡，抵达了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的贝尔威浅水域。在一阵狂风中，它不幸触礁，风吼浪涌，地动山摇，一场旷世罕见的大海难发生了！

“泰兴”号将要沉没之前，人间的爱恨情仇演绎到了极致：游荡艇船长与大副、二副舍生求死，毅然决然与船只共存亡；程剑飞手刃了江太爷，泪如雨下，接受了卖唱女儿梨花的相认；宋慧芝为相爱的入忍辱历炼，为何家夺回了国宝观音瓷塑，获取了何祖耀与她下世为夫妻的许诺；林阿福信守承诺，完成了友人交付女儿的嘱托，使他们平安靠岸。何祖耀历经千难万险，把情人成雅芳送上了“万康号”小船，自己则独自漂浮在茫茫的海面上，眼看阴阳两隔，却幸运地被英国商船“印第安纳”号救起。“印第安纳”号船长詹姆斯·帕尔心怀人性之善，坚定地遵循海上航行的公德，宁愿违约交纳巨额罚款，也要救助蒙难众生，体现了超越种族和国界的人间大爱。

一部沉入海底200年的巨轮，终于在于强的笔下复活了。这是史学与文学的有机融合，史学为纲，文学为目，纲举目张，使这段历史浮屠般展现在人世间。在《泰兴号》中，作者精巧而逼真的艺术构思与史学的真实严谨得到了真切体现。作者也将爱与仁、侠与义、诚与信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通过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留传后世，在多样的人物、复杂的社会、跌宕的情节中，构筑了一个穿越历史、穿行在惊涛骇浪中、宏大的奋进不息的民族精神载体。



《泰兴号》，于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

# 穿越历史的惊涛骇浪

——于强长篇小说《泰兴号》简读

□美学瑛

象中的由俗入雅并不一样。这就促使读者对雅俗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三大视点的提出，体现了《研究》的理论高度，也展示出文献考索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宏大格局。

扎实的文献工作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可以将某种小众文体研究得非常透彻，但要跳出“小众”的局限，还需将其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方能显示出多方面的意义来。《研究》就从民族文化史、社会生活史、清代文学史等多个角度出发，深入考察了子弟书与旗人生活、清代文化政策、汉族文化之间的多元关系，子弟书的历史意蕴也由此变得丰厚起来。当小众的研究对象被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时，或许就不那么小众了。

诚如作者在“余论”中所言：“中国传统说唱文学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随着海内外所藏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整理与公布，很多之前未受关注的小众文体都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研究》的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出小众文体的研究不仅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和毅力，更需要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其实，文献、问题、视野堪称一切优秀学术著作的“三术”，因此，《研究》对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具有积极借鉴意义。